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二十一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 學 研 究

第二十一卷

主 編

袁 行 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袁行霈	陳 來	高崇文	程郁綴
董洪利	趙匡華	趙爲民	閻步克
鄧小南	蔣紹愚	樓宇烈	錢志熙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 逸 民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〇八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二十一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

ISBN 978-7-301-13685-0

I. 國… II. 袁… III. 國學-中國-文集 IV. 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54723 號

封面刊名:集蔡元培先生手迹

書 名: 國學研究 (第二十一卷)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喬 默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3685-0/G · 234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26 印張 500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60.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駱英等先生
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目 錄

《海藥本草》的外來藥物與中外文化背景	陳 明 (1)
“思孟學派”與中國美學	李衍柱 (59)
本體與工夫：鄭霞谷與王龍溪合論	彭國翔 (101)
論三階教與地藏信仰	
——兼論淨土教對地藏信仰的吸收與排斥	尹 富 (127)
《悟真篇》的文本及丹法	朱越利 (157)
《說苑》與早期《詩》學	徐建委 (195)
夏商周秦漢時期宇宙生成類“圖書”的閱讀與分析	江林昌 (221)
湘君、湘夫人的神格與原型	曹勝高 (269)
《二十四詩品》用韻的個性特徵與時代特徵	
——司空圖著《詩品》的佐證	張柏青 (285)
宋金雜劇“副末”兼“淨”考	元鵬飛 (307)
論明清時期的船臺演出	康保成 (323)
北宋宮廷的建築佈局與君臣之間的溝通渠道：以內東門為中心	
.....	王化雨 (351)
中西方社會的批評者	
——章太炎《原道》三篇研究	李 昱 (379)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2007 年大事記 (2007.07—2007.12)	(401)
徵稿啓事	(407)
來稿書寫格式	(408)

《海藥本草》的外來藥物與 中外文化背景

陳 明

【提要】 《海藥本草》是五代前蜀“土生波斯”李珣專門記載外來藥物的本草學著作。李珣一家既保持了波斯人鬻賣香藥的商業傳統，又受到唐五代漢文化的熏陶。其家族的宗教背景可能是景教，而非祆教，而且受到了四川地區道教的影響。李珣的生活年代應該是在九世紀末至十世紀中葉，他不僅在詞學創作上頗有成就，而且留下了一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特色的著作。本文具體討論了《海藥本草》中所蘊涵的中外醫藥學知識的構成，認為《海藥本草》是中古中醫本草傳統鏈條中的一環，是一部融合了域外醫藥知識的中醫著作。在強調《海藥本草》中外來藥物知識價值的同時，筆者也觀察到書中的本土知識對外來成分的選擇、吸收與闡釋的一面。

一般來說，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存在着三條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即西北的陸路、東南的海路以及北方的草原，也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存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乃至醫學都起到了相當大的影響。學術界對這段時期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成果斐然，特別是得益於來自敦煌、吐魯番等絲綢之路重鎮所出土的大量文獻。不過，以往他們關注的重點是中外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交流，而對醫學的傳播頗為忽視。近年來，中國醫學史研究者開始注目絲綢之路曾經存在的醫藥學交流的盛況^①，相信這段

陳明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歷史真相的深入揭示，將有可能對唐宋時代中醫藥成就的多元性做出新的解釋。本文以《海藥本草》為例，對通過絲綢之路傳播的外來藥物情況進行梳理，揭示該書與隋唐外來醫學文化知識的內在關係，並探討其作者李珣作為一名“土生波斯”，是如何將外來的藥物知識與中土的醫學內容進行融合的。

一、唐代關於外來方物的記載

《海藥本草》是一部收錄外來藥物的本草專書，作者李珣是在中國文學史上留名的“李波斯”。要瞭解這樣一部由有外籍血統的人士所撰寫的著作，有必要從唐代的一般士人以及醫藥學家對待外來方物的態度及其相關記載談起。

（一）唐代筆記小說與外來方物

衆所周知，唐朝是古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一個時期，四面八方的使團、商人、傳教人士和移民湧入中國。他們有的是流動的，有的在都市置辦產業，有的還以外來胡人為主體建立了聚落，修建了自己的宗教神祠。他們不僅帶來了大量的異域物品，也傳進了如何使用這些物品的種種生活方式。上至當時的宮廷、士大夫官員，下至民間百姓，在思想層面上受佛教或者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來宗教的衝擊與熏洗，而在衣食住行等物質文化的層面也受到了外來文明不同程度的影響。可以說，在唐代存在着一種好用外來方物的習氣。無論是在于闐、龜茲、高昌、敦煌等西北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點，還是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城市，胡人的生活方式對傳統的士大夫和民間百姓產生了強大的輻射力^②。《太平廣記》所引述的諸多故事，雖然有許多神奇怪異的地方，但是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幅生動的生活畫卷。那些故事有很多地方涉及胡人的生活及其他他們與漢人交往的事跡。對隋唐時期具體的物質文化傳播的研究，薛愛華《薩馬爾罕的金桃》堪稱一部名作，以實物的流變為依託，描繪了唐代外來文明的燦爛畫卷，給讀者以深刻的影響^③。

自《山海經》等開始，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志怪小說”，到唐代逐漸發展成爲一種新的體裁，稱爲“傳奇”。唐代的傳奇小說追求博聞，喜歡談神說鬼，專以記載奇聞異事爲中心。在鬼神變怪之事的背後，表現作者的興味與情致。到中晚唐時期，唐代的傳奇小說有畸形發展的趨向，“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談諧以爲笑樂之資。立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毀前賢，使悠悠者以爲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④。在那些荒唐誕妄的故事之外，唐代的文人還記載了許多外來的方物，其目的“自非觀化察時，周知民俗之事，博聞多見，曲盡萬物之理”^⑤。唐代士人競相喜好外來的方物，特別是有過嶺南生活經歷的人士，接受了新鮮的刺激，對自己使用外來方物的事情不僅不諱言，而且樂於廣泛傳播。唐代文人注意搜集那些有着外來背景的事物，以各種方式來展示。這固然有傳統的博物學的影響，但對新奇的、刺激的事物的熱衷與敏感，則顯然是這些著作不斷湧現的內在動因。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劉恂的《嶺表錄異》以及段公路的《北戶錄》，可以看做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段成式（803—863）是段文昌的兒子，利用父親擔任宰相的便利條件，周遊各地，廣泛結交文人異士，特別是不少的外國人，請教並且記錄各種風土人情、奇聞趣事、有關外來方物的掌故。段成式的門下吳士臯是一名醫生，“嘗職於南海郡”，有機會與外商（舶主）接觸，所瞭解的異域情況多被段成式所採納^⑥。因此，《酉陽雜俎》尤其詳細地描繪了外來的植物、動物、礦物藥物的稱謂、產地、詞語讀音、形狀、顏色和性能等，成爲唐代最出色的博物學著作之一。四庫館臣指出，該書雖然“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笈，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⑦。唐昭宗（867—904年在位）時期，劉恂在廣州任職數年，耳聞目睹，撰寫了《嶺表錄異》三卷。該書是一部專門描繪嶺南風土人情、奇聞趣事的著作，爲讀者提供了與中原迥然不同的新鮮事物的閱讀體驗^⑧。段公路是段文昌的孫子，遊歷嶺南。他的《北戶錄》又稱爲《北戶集錄》，共三卷，被四庫館臣評價爲“載嶺南風土頗爲賅備，而於物產尤詳，其徵引亦極賅洽”。該書不僅記載與中原相異的民風土俗與物產，而且連類引證，與奇書異說相參驗，體現出了“博而且信”的特點。這三

部著作均有着嶺南文化的背景，可以說，嶺南的新奇風物是這些著作的催生劑。

（二）唐代本草著作對外來藥物的記載

唐代文人的博物學著作與醫家的本草學著作，有着密切的關係，相互之間交叉影響，甚至摘錄對方的內容。唐代文人閱讀本草學著作，不僅僅是爲了醫療，而且是將其作爲增加見識的一個文本。這對他們的創作也是一種刺激。唐代的文人對外來物品的記載，其中多處涉及藥物，特別是香藥以及具有特效作用的藥物。唐代的本草學家多是文人，樂於記載外來風物的這一風尚，對出現專門記載外來藥物的本草類著作，也是一種外部的推動力。

中國傳統的本草學在唐代進入了一個較大的發展時期。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一中引用了天竺大醫耆婆（Jivaka）的理論“天下萬物，無非藥者”^⑨。這種萬物皆藥的思想無疑極大地擴大了醫家的視野。從醫學發展的內在軌跡來看，不僅外來藥物大量湧入，而且有異域的本草著作被譯成了漢語。東天竺國法師達摩戰涅槃（Dharmacandra，唐言法月）“學通三藏，善達醫明”。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十四記載，達摩戰涅槃於開元二十年（732）到達長安，“進奉方術、醫方、梵夾、藥草、經書……弟子比丘利言隨師譯語，《方藥》、《本草》，隨譯上聞”^⑩。此處明確指明利言翻譯了來自印度（或者西域）的藥物學著作。雖然我們無法核定這類異域的《本草》著作對中醫究竟有多大的直接影響，不過，它們對中醫應該不乏一定的刺激。外來的藥物固然給中醫生們提供了新的原料，但是，他們無疑面臨着新的難題，即玄宗時期的監察御史楊範臣所說的“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⑪。醫藥界特別需要瞭解這些外來藥物的性能，鑒別其真偽，與本土的藥物相比較，並將其添加到日常應用的藥譜之中。因此，唐代醫學家們對外來藥物的記載及其態度，可以從蘇敬的《新修本草》、陳藏器的《本草拾遺》和鄭虔的《胡本草》中看出來。

唐初蘇敬等編訂的《新修本草》^⑫，同《神農本草經》和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相比，共載藥 850 種，新增藥物 114 種。孔志約《唐本草序》叙述

了當時採錄藥物的情況：“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秘要，博綜方術。”^⑬可見外來藥物經過嚴格的篩選，進入了新增藥的範圍內^⑭。陳藏器（713—741 年前後）的《本草拾遺》作於開元二十七年（739）^⑮，雖然其序言現已不存，但從其所拾遺的藥物（共 692 種）來看^⑯，多為《新修本草》所篩選掉的，不少是舶來品，因此可以推斷陳藏器對外來藥物的態度也是很包容的。開元以後則出現了一些專門記載外來藥物的本草類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鄭虔的《胡本草》^⑰。

（三）鄭虔“三絕”及其《胡本草》

鄭虔是唐玄宗時代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他的詩、書、畫被唐玄宗譽為“三絕”^⑱。《新唐書》載鄭虔喜好博物，“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⑲。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會粹》（或曰《薈蕞》），“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杜甫的長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描繪了他多方面的才華：“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⑳杜甫自注：“公著《薈蕞》等諸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四指出：“故今所云‘神農或闕漏’，以言其於藥石名什乃《神農本草》之不載者也。”^㉑作為唐代第一部主要記載外來藥物的本草專著，《胡本草》被歷代文獻所著錄。《新唐書·藝文志》云：“鄭虔《胡本草》七卷。”《通志》卷六十九云：“《蕃本草》七卷，鄭虔撰。”明代《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云：“開元中，鄭虔《胡本草》七卷。”^㉒《唐詩紀事》卷二十則云，鄭虔著“外國本草，七卷”。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中的“歷代諸家本草”指出：“又鄭虔有《胡本草》七卷，皆胡中藥物，今不傳。”^㉓

《胡本草》七卷，早已散佚，僅有六條內容被引用於段公路的《北戶錄》之中。即《北戶錄》卷二：紅鹽、水韭；卷三：山胡桃、白楊梅、紅梅、山花燕支。另外，筆者發現在董道《廣川畫跋》卷三“書沒骨花圖”條下，也引述了《胡本草》，即：“唐鄭虔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㉔《北戶錄》所引鄭虔的記載，明確提到藥物產地的有以下三種：

“紅鹽”條：“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西北。隋開皇中常進焉。”“紅梅”條：“婆丟迦木出烏菴國，發地叢生，葉大如掌，花白而細，絕芳香，子如升大。”^②又：“鄭公虔云：塗林花有五色，黃碧青白紅，如杏花。”從這三條去推測，《胡本草》的記錄側重來自西北胡地的藥物，但也不乏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東西^③。

從殘存的條文來看，《胡本草》主要描繪藥物的產地、形狀、顏色、氣味等，仍然有較明顯博物性質的筆記文體色彩，而五代時期李珣的《海藥本草》擺脫了博物類、雜記類著作追求奇聞異事的風格，雖然其中也夾雜了一些傳聞和故事片斷，但主要討論藥物的性能、炮製法、主治功能，還列出了方劑的組成，可見，《海藥本草》的中心不再是“博物”，而是醫學專業範疇的本草，這在醫學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四）傳世醫書中相關的外來藥方

本草文獻中著錄的外來藥物，在實際醫療中的具體使用情況，可以從醫方類的著作中看出來。在唐代的主要中醫著作中，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燾的《外臺秘要》（或作《外臺秘要方》）均有不少胡醫方^④。在醫方中所使用的胡藥，來源是較廣的，包括天竺、波斯、中亞、南海等地。試以《外臺秘要》中所記錄的波斯藥物為例。該書中有波斯白石蜜、波斯鹽綠、真波斯青黛、波斯鶴虱、葦撥（舶上者）等。波斯石蜜，在敦煌 S076《食療本草》殘卷中有所記載。“石蜜案右心腹脹熱，口乾渴，波斯者良。注少許於目中，除去熱膜，明目。蜀川者為次，今東吳亦有，並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膝（乳）汁，煎則細白耳。”^⑤可見，波斯的石蜜在當時是質量上乘的。《外臺秘要》所提及的這些藥物的醫方主要如下：

《外臺秘要》卷三，“天行發瘡豌豆胞瘡方一十三首”，引《千金》療人及六畜天行熱氣病豌豆瘡方：“又方，真波斯青黛大如棗，水服之瘥。”類似的方法見於佛經之中。“若身有腫處。以咒泥塗之，用青黛規院其上，即差”^⑥。波斯青黛最常作藥用。《冊府元龜》卷九七一記載，開元五年（717）

三月，康國進貢青黛。與青黛相關的是螺子黛，馮贇《南部煙花記》云：“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官吏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⑨這同樣是用來畫眉的美容化妝品，很可能是同一種物品。丹波康賴《醫心方》卷四、卷廿六，三處摘錄了《隋煬帝後宮香藥方》，但沒有使用青黛。

《外臺秘要》卷二十一的“眼暗令明方一十四首”：“《近效》療眼中一切諸疾盲翳……波斯鹽綠一兩，色青，陰雨中口乾不濕者是。真石鹽二兩 硃砂二分，以上四味各別研 烏賊魚骨一兩，去上甲，別研。”^⑩“又療眼中一切諸疾，青盲翳者，天行風赤，無端忽不見物，悉主之，此方兵部侍郎盧英所傳，價重千金。石膽研 波斯鹽碌研 石決明 烏賊魚骨去甲 鉛丹 細辛 濃沙各三分，疑 蕤人三兩，碎 馬蹄決明二兩，淨口 防風三兩 末 秦皮二兩，支……夏侯拯處傳。”^⑪這兩個藥方中的波斯鹽綠（鹽碌），最早見於《魏書·西域傳》，是波斯國的出產之一，即《海藥本草》所記載的“綠鹽”：“謹按《古今錄》云：波斯國，在石上生。味鹹、澀，主明目，消翳，點眼，及小兒無辜疳氣。方家少見用也。按：舶上將來謂之石綠，裝色久而不變。中國以銅、醋造者，不堪入藥，色亦不久。”

《外臺秘要》卷二十六的蛔蟲方九首，“崔氏療蛔蟲方……又方，波斯鶴蝨三兩”^⑫。鶴蝨（*Artemisia Cina*），不見於《海藥本草》。唐《新修本草》卷十一云：“鶴蝨，味苦、平，有大毒，主虻蟻，用之爲散，以肥肉臠汁，服方寸匕，亦丸散中用。生西戎。”蘇敬（恭）的注指出該藥“胡名鶴蝨。”宋初《開寶本草》列出了鶴蝨的幾個主要產地，“出波斯者爲勝”。鶴蝨是殺蟲之主藥，後世多用^⑬。《普濟方》卷二三九“鶴蝨散”，即以“波斯鶴蝨三兩”爲主藥，“療虻蟲并三蟲諸蟲”。

《外臺秘要》卷三十一所引《廣濟方》的“吃力伽丸方”中，提及了“葦撥舶上者”，但在《醫心方》卷第十三所引該藥方則爲“吃力伽丸方：吃力伽白木是……葦波斯者”^⑭。則表明爲葦撥來自波斯。此外，前文所述《千金翼方》的“服牛乳補虛破氣方”，使用葦撥，也是一個重要的波斯方劑（悖散湯）。

傳世醫書中所使用的《海藥本草》藥物主要有：畢撥、訶梨勒、毗黎勒、阿魏、阿摩羅、橄欖仁、龍腦油、蜜陀僧、石蜜、犀角、鬱金、硃

砂、蘇方木、青木香、龍腦香、薰陸香、甘松香以及等多種香藥。因此，只有將《海藥本草》放在中古中國的外來文明的網絡中，才能梳理其特殊的貢獻。

二、《海藥本草》的作者及其文化背景

(一)《海藥本草》作者李珣的生平

關於李珣生平的資料非常缺乏，無法知道他的確切生卒年份^⑧。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認為他是唐肅宗（756—762）、代宗（763—779）時人，這已經被證明是一種誤解，因為《海藥本草》中引用了唐懿宗時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初撰於843年，補記於853年）中的資料^⑨。直接記載李珣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五代後蜀何光遠的《警戒錄》卷四“斥亂常”條云：

賓貢李珣，字潤德，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與李生常為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⑩

其二，宋代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二“李四郎”條：

李四郎，名珣，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珣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為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為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惟道書藥囊而已。^⑪

其三，後蜀趙崇祚《花間集》謂：

李珣，字潤德，先世波斯人，蜀秀才，著有《瓊瑤集》若干卷。南宋朝王灼《碧雞漫志》亦提到李珣的詩詞。

其四，清初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十四，也有兩條史料，如下：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絃之兄也。珣以小辭爲後主所賞，常製《浣溪沙》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

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爲頓損。鶚累官至翰林校書。

學界對李珣的生平研究，基本上不出上述史料的範圍⁴⁰，但具體的解讀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得出的結論甚至有相互衝突的地方。

李珣先祖原來的波斯姓氏，以及何時來華，已經無法知道⁴¹。榮新江先生在《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一文中指出，唐代來華的波斯人分爲兩類：薩珊波斯的王族、首領和使者；商人。前者“進入唐朝的各級官僚體系當中”，後者則多由海路而來散居於南方城市以及長安等地。與唐代粟特系統的胡人保留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尋、戊地等）的姓氏不同，波斯人以唐朝的國姓“李”爲姓，是“他們融化在中國社會中的一條重要途徑”⁴²。來華波斯人有些由唐朝廷賜姓李，比如，曾經擔任過唐代司天監的波斯人李素，年輕時就生活在廣州，他的祖父李益作爲質子而被賜姓李⁴³。或者是因爲軍功，如曾擔任華州刺史等職的安息人李元諒。可能是朝廷冊封的情況在先，然後一些波斯人爲了生活的方便，或者貿易的便利，自己冒姓李。除李素外，貞元（785—805）初年將《都利聿斯經》帶到京師的都利術士李彌乾，也是一位在中國波斯天文學交流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李姓波斯人⁴⁴。

與香藥或者醫術有關的唐代波斯系胡人，取姓李的人士最著名的是曾經向唐敬宗貢獻沈香亭子材的李蘇沙。陳垣認爲李蘇沙可能是李珣的先人⁴⁵。對這一推測，有些學者信從並且坐實，而有些學者持慎重的態度而難以接受⁴⁶。此外，南唐（937—962）王紹顏的《續傳信方》記載，還有元和七年（812）向擔任廣州刺史的鄭綱獻補骨脂藥方的李摩訶⁴⁷。李摩訶雖爲南海訶陵國的舶主，但很可能是波斯人⁴⁸。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十二《和樂天送客遊嶺南十二韻》詩中有“舶主腰藏寶，黃家砦起塵”的詩句，並注

曰：“南方呼波斯爲舶主，胡人異寶，多自懷藏，以避強丐。”^⑨此前在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從中國東渡日本的波斯人李密醫，也可能是一名醫家^⑩。

李珣家族隨唐僖宗入蜀的時間，是在廣明元年（880），這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在於對李珣何時生活於廣州的時間，存在不同的理解。羅香林認爲李珣是因爲避亂而隨唐僖宗入蜀的，李珣也是從外地遷居入蜀的，並非出生於蜀地，其先居之地應該是廣州。因爲李珣詩詞中描繪了典型的廣州風物，《海藥本草》中的大量藥物是由海舶運至廣州的，且書中引用了不少的嶺南志書。他的另一個證據是韋莊《江上別李秀才詩》一詩：“前年相送灞陵春，今年天涯各避秦。莫向樽前惜沈醉，與君俱是異鄉人。”^⑪而尚志鈞認爲，李珣是在前蜀滅亡（925）之後出川而遊歷嶺南的，其弟李玘擔任過唐僖宗入蜀的率府率（一般的護衛）^⑫。實際上，上述兩種解讀都存在錯誤。因爲上引《茅亭客話》“李四郎”條的下文記載：

（李玘）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⑬，論淮南王煉秋石之法，每焚香薰之。有一核桃盃，圍可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遊青城山，於六時巖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雁卵，色黑溫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墮於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⑭

雍熙元年是984年，這說明李玘應該至多生於前蜀建國（908）前後，而不可能在廣明元年（880）隨僖宗入蜀，被授率府率的只能是他的先人。何光遠的《警戒錄》是記載李珣生平的最早史料，明確指出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這說明李珣從小就很用功學習，多次被舉薦爲前蜀的賓貢時^⑮，年齡並不太大。

推測李珣生年的另一個依據爲李珣的妹妹李舜絃擔任前蜀後主王衍（919—924年在位）的昭儀（地位僅次於皇后）^⑯，年齡應該與王衍（899—925）相若，二十歲左右，不可能太大。如果李珣是在880年入蜀，即使當時

是幼年，到前蜀建國中間相隔約三十年，與“少小苦心，屢稱賓貢”也不相符。況且李珣與李珣、李舜絃的出生年差別不可能在三十歲開外。韋莊（836—910）曾經兩次入蜀（分別在896—898年和900年），其筆下的李秀才，也不一定是指李珣。韋莊的筆下共四次提到了李秀才。其中《送李秀才歸荆溪》詩云：“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說明李秀才是經三峽而返回原住地荆溪（今江蘇宜興）。該詩創作於892年，這位李秀才不大可能是李珣^⑤。同時也無法確定李珣就一定是880年遷居入蜀的。況且《江上別李秀才詩》所述的瀘陵地處長安，李珣何時生活於長安，又是一個難解之謎。因此，在沒有確切的史料證明之前，不妨這樣認同：李珣的先人從長安隨唐僖宗遷居入蜀，擔任過率府率。李珣生活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中期，任職於前蜀，後來遊歷或者居留廣州。

（二）李珣的宗教背景：道教、景教或者祆教

因為李珣家族是波斯移民，那麼他的宗教背景自然是值得關注的。就現有的資料而言，李珣受道教的影響，樂於煉丹。李珣的《海藥本草》中也提到了好幾種藥物與煉丹的關係。李珣還創作了兩首《女冠子》詞，描繪女道士的清雅形象。這說明他也很可能受到自家兄弟的影響。此處有兩個問題：其一，李珣是否還堅持家族原有的宗教？其次，家族原有的宗教是什麼？唐代的三夷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波斯均有分佈，且以祆教為主。黎國韜在《二郎神之祆教來源——兼論二郎神何以成為戲神》一文中提出，前蜀後主王衍信奉祆教信仰，“因李氏兄妹信仰此教而影響王衍之信仰，甚有可能”^⑥。五代的前後蜀的皇族信仰是否真為祆教，還值得進一步商榷。至於李氏兄妹信仰祆教，幾乎沒有確切的文獻證據（詞中的“金彈子”尚不足為憑），而且李珣僅僅為一賓貢，對王衍的影響遠不如想象中的那麼大。如果王衍果真與他同宗祆教，李珣何至於“屢稱賓貢”而鬱鬱不得志呢？因此，即便王衍的民俗活動中有祆教的因素，也不等於李珣一家就是祆教徒。

羅香林則推測李珣家族原有的信仰是景教^⑦，因為唐代入華的景教徒中

有不少善醫者，如秦鳴鶴以及僧崇一。九世紀中期，蜀中有景教醫僧的存在。文宗太和三年（829）在成都被掠人中就有“醫眼大秦僧一人”^④，應即兼職醫事的大秦景教徒。羅香林還指出段成式《異疾志》中的醫士秦德丘也是景教徒。蔡鴻生教授關於唐代三夷教的傳播模式，有一猜想式論斷，即“摩尼教異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伎化”^⑤。可以說，景教的傳播就相當程度上借重了醫術。香藥與珠寶貿易是波斯胡人在唐代最時興的職業。李珣的弟弟李玘以販賣香藥為業，李珣家族應該也是從事香藥貿易的。從李珣家族的職業以及本人精通本草學來看，筆者傾向於接受羅香林的推論，李珣有可能是受了道教影響的景教徒。但這一推測缺乏證據，還有待證明。李珣的詩詞或許還能給我們一個側面的證據。有學者注意到李珣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了“酒”，對酒的描寫反映了他的穆斯林文化背景。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伊斯蘭教是禁止飲酒的^⑥。這正說明李珣不可能是穆斯林，倒可能是景教徒。

（三）“李波斯”的詩詞與《海藥本草》的呼應

唐代是一個文化開放的時期，域外人士在華接受漢文化的教育者，不勝枚舉。新羅人崔致遠於僖宗朝時科舉及第，在唐任職多年，留下了文集《桂苑筆耕集》。阿拉伯人李彥升曾經參加科考，也榮登進士榜。作為一名“土生波斯”，李珣無疑接受了漢文化的熏陶。從他兄妹的取名：“珣”（字“德潤”）、“玘”（字“廷儀”）和“舜玘”來看，他這一代可能華化程度已經很深。李珣是中國中古文學史上一名出身異域的詞作家^⑦，李舜玘則是唯一有記載的域外女詩人。洪邁《絕句》中收載了李舜玘的《蜀宮應制詩》、《釣魚不得詩》以及《隨駕遊青城詩》三首詩。楊慎《詞品》中還提及了李舜玘的另一首詞《鴛鴦瓦上》。李珣從小用功學習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詩詞歌賦，所寫的詩詞“往往動人”，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在尹鶚等具有輕視四夷心態的士大夫那裏，李珣學習詩文，屬於“亂常”（不符合常倫）的舉動，是勉為其難，因為異域蠻夷重視的是“武強”（武功），而不是文采風流。他即使學得一些細枝末節，也不可能有什麼特別出彩的地方。然而，也許正是這種“少小苦